

民族史学视阈下甘青藏族与蒙元关系刍议

葛艳玲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蒙元时期,中央王朝结束了分裂格局,在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甘肃青海地区藏族的统治。凉州会晤是蒙元时期甘肃最具历史性的活动,萨班和阔端的友好会谈开创了蒙、藏民族间的友好关系。以蒙古贵族为首的封建专制政权通过宗王分封、设立行省、设置站赤、清查户口等举措对甘青藏区进行管理;甘青藏区作为西藏与内地联系的必经通道,其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发展,甘青藏区的“茶马贸易”加深了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了汉、藏、回等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甘青藏区藏传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建筑及绘画艺术在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和传播中得以实现。

关键词:甘青藏族;蒙元;关系

中图分类号: D691.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51(2011)05-0099-05

收稿日期: 2011-08-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0BMZ001)

作者简介: 葛艳玲(1980—),女,新疆石河子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学。

蒙古人最初以“蒙元”或“蒙瓦”之名见于史籍,额尔古纳河是他们的发祥地。^[1]随着蒙古军的日益壮大,并先后灭掉西夏、金、南宋等王朝,随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众多的民族都处在同一个蒙古贵族集团为主的中央政权统治之下,西藏与中原王朝发生政治隶属关系始于蒙元时期,被纳入中央王朝政治体系的西藏,结束了分散割据的状态,进入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社会发展阶段。

元代称甘肃青海藏族主要聚居区为“吐蕃之地”,他们主要分布在甘肃的阶州、凉州、河州、巩昌、宕昌、洮州、岷州、肃州、永昌、山丹、甘州、以及青海东部农业区和西宁、黄南、海南、海北、海西、果洛、玉树广大地区。经过宋代的大改组和大分化,接近汉族地区与中原经常发生联系者,被称为“熟番”或“熟户”,而居于偏僻之地不常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者被称为“生番”。当然还有不在此两种之内的许多其他藏族部落。随着吐蕃王朝的衰败,藏族已遍布甘肃和青海全省,人口甚多,这是自吐蕃兼并青藏高原各部落之后的第二次民族融合时期,也是甘青藏族与蒙元关系发生演变的关键时期。

一、蒙古军南征:统一甘青藏族诸部

成吉思汗建国后,为了巩固汗国政权,增强了综合国力,开始发动大规模的连绵不断的战争。据韩儒林的《元朝史》记载:在灭夏战争中成吉思汗在灵州击溃西夏主力后,分兵进攻中兴府,自率一军南下,攻占了积石(今青海循化),西宁、洮(今甘肃临潭县)、河(今临夏)这些地区的一些藏族部落可能归附了蒙古。^{[2](P164)}据史料记载,元太祖二年(1207年),成吉思汗率军南下,先征西夏,攻克斡罗该城,接着成吉思汗进入河西,打败西夏军,进围中兴府(西夏国都,今银川),1226年再征西夏,先后攻占黑水、甘州、肃州、凉州、灵州等城。1227年春,成吉思汗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今青海循化),二月破临洮府;三月拔洮州、河州、西宁三州;四月占德顺等州;闰五月避暑于六盘山;六月西夏王李睨降;七月成吉思汗病逝于清水行宫。也有史料说是病逝于萨里川哈老徒行宫(今乌拉巴托东)。^[3]^(P226)成吉思汗死后,其第三子窝阔台于1229年继承汗位,1230年攻打金国,1234年金灭亡。1235年窝阔台第三子阔端奉命从攻宋前线领兵向西,经略

河陇,并将原西夏的西部领土作为其“份地”。阔端筑宫室于凉州,今甘肃河西走廊武威城北,称永昌王。此年蒙古军围攻秦州、巩昌,九月守巩昌的汪世显降。1236年10月蒙古军又破宕昌、阶州、文州,临洮等地的藏族部落纷纷归降。唃廝囉后裔原金朝熙州节度使赵阿哥潘和赵重喜父子也降蒙古,阔端命赵阿哥潘为迭州安抚使,招抚甘南、河曲等地的藏族部落,立城堡、课农桑,黄河上游进入蒙元版图。

二、阔端与萨班凉州会晤:拉开蒙、藏民族友好关系的帷幕

萨班和阔端在凉州的会晤是蒙元时期甘肃最具历史性的活动,这次会晤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的划时代意义,它开创了蒙、藏民族间的友好关系,为实现祖国统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凉州会晤

元太宗窝阔台继蒙古国大可汗位后,让其子阔端坐镇甘肃武威,当时,执政者的注意力在西亚和东欧,想以和平方式解决藏区民众的归顺问题。于是,1239年,阔端派道尔达(也称多达那波)进兵乌思藏,蒙古军行进到热辰寺附近,与藏族发生冲突,“公元1239年阔端进入青海,次年(1240年)派遣道尔达远征入藏,遭到抵抗,遂焚毁热辰及杰拉康两寺,杀死僧众若干人。”^{[4](P225)}至此,这支蒙古军在拉萨一带留驻达两年之久,也再未与当地僧俗势力发生武装冲突,而且还同他们开始了和平地接触和频繁地交往。由于了解到前后藏僧俗割据势力,以及藏传佛教各派间势力交错,蒙古军队长久派兵统治难以实现。不久,蒙古军即撤出乌思藏。这次进军虽然没有结果,但其影响却很大。一方面,乌思藏方面意识到了蒙军的强大,蒙藏间的关系绝不是以武力所能解决的,决定派人与蒙古军接触,从而确定与蒙古的联合;另一方面,蒙古军也了解到藏区的形势“现在卫藏地方,以噶当派的寺庙最多,分布最广;达垄教派(即达垄噶举)戒律清整,富有德行;止贡派(即上贡噶举)的京俄大师最有法力;萨迦派的班督达(即萨班)通晓‘五明’。请主公设法延致之。”^[5]至于迎请谁,蒙古当时也在做选择。据《西藏王臣记》载,最早迎请的是止贡派的京俄大师,但京俄谢绝了。后又以皇子的函扎和敕令给萨班,派遣道尔达和杰门带着礼物和信件,邀请萨班到凉州去和阔端见面商谈“卫藏归顺蒙元”之事,迫于形势,萨班不顾64岁高龄,于1243年

带着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两人前去凉州,经过三年的跋涉,于1246年8月到达凉州,萨班到达时,阔端不在凉州,而在和林参加选举大汗的会议,他们次年才会面。也就是1247年年初,萨班和阔端在凉州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阔端代表蒙元汗廷,萨班代表西藏地方,共同议定了归附条款:“一、各地世俗首领,官仍原职;二、任命萨迦派首领为大鲁花赤,赐金、银符;各地官员处理政务应请示萨迦长官,不许自由行事;三、各地编出籍册,开列官员姓名、俗众人数和贡赋定额,一式三份,一份进呈,一份交萨迦,一份由本地官员保管;以后由朝廷官员与萨迦官员共同征收国赋。”^{[2](P251)}阔端与萨班会晤后,对萨班印象极好,认为他不仅有萨迦派教主的地位,而且佛学知识渊博,阔端扶植萨迦派,命其管理西藏一切政教事务,萨迦派从而取得了在西藏各地方僧俗势力中的领导地位。凉州会谈揭开了蒙藏关系史上新的一页,“这次会晤是历史上一项重大的事件,它关系到后来元代中央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奠定了西藏地方直辖于中央的基础。”^[6]当然对甘肃青海藏区的影响也非常之大,“从此,青藏高原各地包括西藏,完全统一于中央政府管辖之下。”^[7]

(二)萨班接受阔端的邀请并签署协议

萨班为什么会接受阔端的邀请?其原因可以从两方面考虑,首先是他看到蒙古军事势力的强大,而西藏由于地方割据、长年战乱处于弱势,僧众领袖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不抱幻想归顺蒙古是大势所趋;其次是考虑到阔端邀请他是为了让他在西夏故地发扬佛教,西藏地区藏民较为集中,而甘青藏族分布较散,其宗教影响力较弱,在这种情形下,萨班也就接受了阔端的邀请并签署了协议,使萨迦派成为了“政教合一”的集团势力。出于政治上、军事上的需要,蒙藏的联系愈加紧密,这是一种富有政治和宗教色彩的联盟。

凉州会谈成功,也避免了因武力征讨藏区带来的破坏和流血牺牲,使西藏及甘青藏区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萨迦派作为蒙古王室代理官员“达鲁花赤”行使职权,“各地长官亦毋不与萨迦金字使议而擅权做主”,蒙元结束藏区持续400年的各自为政,四分五裂、不相统属的局面。

三、甘青藏族与蒙元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上的关系

元王朝是蒙古贵族在征服各民族之后建立起

来的少数民族政权的封建王朝,因此,蒙元显示出比以往中原王朝更为浓烈的民族色彩。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继帝位,改国号大元,封八思巴为国师,中国再一次实现了统一。蒙古对广大甘青藏区的统治,在成吉思汗时得地不守,窝阔台时把原西夏领土封给阔端,命他经略,蒙哥时在河州设吐蕃宣慰司管理安多藏区事务,忽必烈时始定官职和宗王镇守制,“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吐蕃之地”,推崇喇嘛教,推行政教合一制度,促进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合作。

(一)蒙元在甘青藏区的施政,加强对甘青藏区的管理

元朝治理吐蕃地区主要靠的是一种含有政治性的宗教羁縻政策,这是由于吐蕃地区特殊的情况决定的。《元史·释老传》云:“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吐蕃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此番话是对蒙元治理吐蕃政策的说明,即通过扶植宗教势力,以促进政教合一,针对蒙元在甘青藏区实施的具体政策归纳如下:

1.宗王的分封和帝师制。

1269年,忽必烈封第七子奥鲁赤为西平王,以吐蕃为封地,置府算木多,镇守青海和吐蕃(甘肃青海牧区)。奥鲁赤死后,他的长子镇西武靖王铁木儿不花和他的孙子承袭这块封地,“足见蒙元时期西藏始终是元世祖第七子一家的采邑”^[8]。通过这三系宗王镇抚吐蕃可以看出,“阔端一系是驻守甘肃西部,忙哥刺一系是驻甘肃东部,奥鲁赤一系是驻四川,这样完成了对吐蕃自北至东半圆形的部署”,“元初受西宁州分地的章吉驸马,也是镇抚吐蕃的一个单位”^[9],镇守湟水和庄浪河一带的是弘吉剌部的章吉兄弟,弘吉剌部与蒙古王室世代为婚姻。镇守撒里畏吾儿地方即今青海柴达木西部草原和甘肃敦煌一带的为宁王卜烟帖木尔。1280年忙哥刺死后,其子阿难答袭位后,驻河西走廊,是西北最大的藩王,他在军中推广伊斯兰教,其部众15万人大半信奉了伊斯兰教,阿难答死后部众散河州东乡者,后来形成东乡族^[7],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诸王的权利逐渐削弱。

帝师制是元朝创立的新制度,也是统治吐蕃地区的另一项重大举措。帝师由皇帝任命。是中央

政府的一个特殊官吏,由于吐蕃地区信奉佛教,据《元史·释老传》忽必烈采取“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政策。即位后即封八思巴为国师,“中统元年(1260)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4](P233)}《元史·释老传》记载:“[世祖]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1272年元设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帝师领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并把乌思藏十三万户僧俗和吐蕃三地面(指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即西藏、康区和安多)连同其地僧俗都赐予他。从八思巴受封为帝师,经元历代都有帝师,他管辖全国的佛教,是佛教最高领袖的象征。据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统计共有十多位帝师。

2.中央政府设有宣政院专门机关,管理藏区政治事务。

“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这就是说,宣政院一方面管理全国的释教宗教事务,一方面又管理藏区的行政事务。宣政院属下的吐蕃地方行政机构是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一是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朵思麻宣慰司),主要管辖今甘(甘南河州一代)、青(青海中东部)藏区和四川阿坝等地,治所在河州(临夏);二是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朵甘思宣慰司),主要管辖今四川甘孜州和西藏昌都地区一部分,治所在甘孜一带;三是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乌思藏宣慰司),管辖卫(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藏(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阿里等地。具体管理藏族地区的军政事务,元朝皇帝授予他们金银牌、印和宣敕。在临近内地的民族杂居地区,则设路、府、州、县。正如《元史》中言:“郡县吐蕃之地,设官分职”这样,蒙元在吐蕃完成了统一的地方行政建制。

3.清查户口、设置驿站。

蒙元在吐蕃之地派遣官员清查户口和设置驿站,其目的是“通达边情,布宣号令”进一步加强对藏区统治。

清查户口是在阔端通过萨班给乌思藏的信中提出的。忽必烈即位后,就派遣由总制院使答失蛮率领的一批官员到乌思藏清查户口,1268年正式进行土地和户口的清查,这次清查不限于乌思藏,还包括青海和四川西部的地区。对吐蕃广大地面清查户口,是从朵思麻开始的,“薛禅皇帝之时,在对吐蕃广大地面清查人口户籍时是从朵思麻开始清查的。”^[10]这次清查乌思藏各地平民数为32301户。

蒙元在吐蕃还设置驿站,根据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一份文书记载,元朝在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三道共设大站28处,小站7处。(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经典大典,站赤)驿站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单独系统,每站有朝廷设一站官管理,驿站的事务,由宣慰司报宣政院。

4.派遣军队,征收赋税徭役。

蒙元还在甘青藏区派遣军队,征收赋税徭役。其中承担的赋税有:差发(即赋役)、乌拉等。阔端时,在甘青藏区实行有马百匹,输牝马一,牛百者,输牝牛一,羊百者,输羖羊一,称“羊马抽分”制度,以后推广到全国。1285年,甘肃行省设“西宁州等处拘榷课程所”负责税收与转运事,牧区以马为赋,农区为田为赋即杂税,“凡种田者,白地每亩赋税三升,水地每亩五升。”(元史·食货志)杂税达三十多项。元朝的刑律、历法、钱钞等都在甘青藏区普及和使用。

(二)贸易往来增进与甘青藏区民族间的经济交往

元朝中央政府通过萨迦本钦指挥西藏十三万户,从而结束了青藏高原近四个世纪分裂割据的混乱状况,在相对稳定、统一的局面下,蕃人休养生息,甘青藏区作为西藏与内地联系的必经通道,其社会经济也得到了发展。

甘青藏族以畜牧业为主,得利于优越的自然条件比其他藏区发展较快,经济也相对繁荣,尽管在秦、巩等地的藏民受到汉族农耕文化影响,部分部落已从事农耕生产或半农半牧,但数量较少。河西区自古有“畜牧为天下饶”的美称,甘肃良马,包括河西马、甘南马,历来驰名国内外。甘肃藏区处于中西交通要道且临近内地,与其他民族的联系较为密切,便于开展与西域各民族间的贸易往来。

元代,由于蒙古族长期从事畜牧业,马匹已不再依赖藏区,因而“茶马互市”较以前少了,然而,藏族的生活离不开茶,为了对藏区实施羁縻、征收税务,蒙元并未放弃对茶叶买卖的控制,在“京兆、巩昌(甘肃陇西)置局发卖”(续文献通考,卷二二)可见,甘青藏区的“茶马贸易”依然存在,并随贸易往来汉、回等民族的商人逐渐移居藏区,与藏族杂居,加深了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了汉、藏、回等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藏传佛教各派及其艺术的传播,加深甘青藏区民族间的友好感情

在甘青地区,汉传佛教的传播要早于藏传佛教,但这也恰恰为藏传佛教在甘青藏区的传播和兴盛奠定了基础。

蒙元初期,对各种文化采取积极的吸收态度。早在宋末,噶举、萨迦、宁玛等派已传到甘青藏区,蒙元时代,凉州会晤以后萨班便在凉州弘法,兴建或扩建了白塔寺、南灌顶寺、西莲花寺、海藏寺等。八思巴等萨迦派高僧在卓尼、甘加、凉州弘法,同时噶举派的高僧也在凉州、甘州和宁夏一代传法。

居住在甘肃祁连山北麓的裕固族早在唐末、五代时期就与居住于此地的藏族有了接触。随藏传佛教的传入,两个民族的交往逐渐密切,藏族文化也逐渐向裕固族民族渗透,进而对裕固族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影响。元代,裕固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萨迦派。裕固族平时的婚丧嫁娶、礼节问候都带有浓厚的藏族文化,有些裕固族的姓名是藏名且具浓郁的宗教意味。裕固族虽有自己的语言,但其中也吸收了不少藏语词汇。宗教用语则基本上是藏语,所用佛经均为藏文经书。黄河流域与湟河流域广袤的地域,分布着土族,13世纪,蒙古军队在西进过程中,曾有数批留此地的吐谷浑人融合,公元15世纪以来,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土族地区传播并盛兴。就土族语言来说,可分为互助(包括青海大通、甘肃天祝等)、民和以及同仁三大方言区。但无论哪一方言,历史上与藏语的关系都十分密切,土族语言中吸收和融合了不少藏语(安多方言)的成份。土语中有关宗教的词语,基本上借用了藏语。^[11]藏传佛教在其他民族的转播也使得甘青藏族与其他民族间的交往不断加深。

在中国历史上,不论是宋代还是蒙元,统治阶级都积极扶植佛教。其一是利用高僧大佛,封予职位,参与施政;其二是广建寺庙,传播教义,尤其是佛教“普渡众生”、“利乐有情”、“众生平等”等思想,对战乱中的人们来说,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其三是佛教从统治阶级走向民间,成为统治阶级维持其政权的一种有利工具。^{[3](P268)}甘青藏区在封建化的过程中,与佛教的传播发展联系紧密。

蒙元时期开凿敦煌千佛洞窟五个,其石窟艺术与藏传佛教壁画艺术的内容、形式、风格一脉相承,系出自藏族画家之手,可以说敦煌是由宁玛派护持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说唱本,不仅传至甘青藏区,而且逐渐传至蒙古及其周边民族,使藏族艺术发扬光大。正如《门岭之战》中所说:“汉藏之间亦有缘,汉地善业传藏地,藏地普法传汉地,

藏汉如同日和月,彼此之间离不开,因缘相连成一家。”^[12]居庸关元代雕刻艺术就是藏族风情的完美艺术遗物,关门边墙上刻有蒙古字、畏吾尔字、八思巴字还有汉字。由此可见,民族文化的传播不仅推动了民间民族文化自身的变革,也拓展了民族间交往的空间,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也总是在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和传播中得以实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甘青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构成了中国不多几个种族文化交流的区域之一,是黄土高原缔结青藏、内蒙古两个游牧民族的纽带。探讨蒙元与甘青藏区的关系,单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看,是促进了民族的融合,蒙藏与其他民族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更为紧密;从中央对地方的统治角度来看,通过设驿站、建立地方机构、清查户口、贸易通商、宣扬佛法、广建寺庙石窟等举措,和平解决了西藏及甘青藏区的问题,中央行使了主权,地方得到了发展,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得以实现。甘青藏区“经过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几十年的经营,结束了自唐中叶以后的氏族纷争和血战,实现了祖国历史上又一次大统一”,有利于甘青藏区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元史研究汇编.元史论丛:第一辑[M].北京:中华书局,1982.12.
- [2]韩儒林.元朝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3]洲塔,乔高才让.甘肃藏族通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
- [4]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 [5]宗华,李延恺.安多藏族史略[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10.
- [6]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133.
- [7]半一之.黄河上游地区历史与文物[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395.
- [8]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J].历史研究,1958,(08).
- [9]扎奇斯钦.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之研究[M].台北:台湾正中书局国立政治大学丛书,1980.176.
- [10]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151.
- [11]赵永红.藏传佛教在凉州的传播及影响[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6,(6).
- [12]格萨尔王传·门岭之战[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60.

National History Depending on the Tibetan People in Gansu Qinghai and under Mongolian Yuan Hermeneutic Relationship

GE Yan-ling

(Northwest Minority Research Center,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Gansu 730020,China)

Abstract:In Yuan Dynasty,the central government ended the split pattern and took Tibet into China's territory,and also strengthened the governing of Tibetan in Gansu and Qinghai.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betan in Gansu and Qinghai and Mongolian government from Mongolian army marched south to unify the Tibetan tribes in Gansu and Qinghai. Liangzhou Meeting was the most historic event in Yuan Dynasty,and Sarbanes-friendly talks created a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golian and Tibetan.To the Mongolian nobles,led by the feudal autocratic regime,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vince,setting station red,inventory accounts and other initiatives on the Qinghai-Gansu area management,as a necessary channel between Tibetan area in Gansu and Qinghai and the Mainland Area,it also took development in socio-economy,in which "tea-horse trade" in Tibetan area in Gansu and Qinghai deepened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n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Han,Tibetan,Hui and other inter-ethnic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m in Gansu Qinghai-Tibet area makes the achievements in Buddhist architecture and painting in the inter-ethnic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Key words:Gansu and Qinghai Tibetan;Mongolian;Yuan Dynasty

责任编辑:张奎华